

福建省图书馆藏

莆田文史資料

第二十一輯

政协福建省莆田县委员会编

莆田文史資料

(“三胞”專輯)

政協福建省莆田縣委員會編

1996年5月

目 录

记莆田籍南侨机工回国参加抗战的英勇事迹……本报资料室	(1)
椰城兴安会馆光荣片断——值得回忆的史料……陈琴棋	(24)
纪念亡友吴钰荪同志……张兆汉	(30)
解放初期有关福建沿海航运概况的回忆……程文铸	(34)
近代莆田开拓泰国侨居地的第一人	
——林宗谟先生传略……王 烁	(43)
怀念郭微甫先生……郭 佳	(50)
忆二哥关启成……关启新	(53)
缅怀许国雄先生……陈丽娟 整理	(59)
李孟珠话诗钟……李锦涛	(63)
林君兆麟行状……林祖韩	(66)
回忆《砂朥越日报》……涂元怡	(75)
砂朥越乡贤涂耐冰先生事略……康永福	(78)
宋元模与《莆田乡讯》……林元伯	(81)
潘有声和胡蝶……蔡 麟 整理	(84)
忆晴山兄……林远堂	(89)
陈晴山的一生……林祖韩	(92)
王义宋与霹雳妇女裁剪训练所……林 桦	(98)
忆念先父余元祥……余清英 余锦水	(101)
陈少白诗选……陈长城	(103)
回忆郑宾王老师……黄励中	(106)
献身华校教育的方步樵老师……凡 生	(109)

在新加坡拉人力车的一段回忆

-陈吓尔口述 黄黎强整理 (111)
一位南洋华工的辛酸史.....黄黎强 (116)

- 赤港华侨农场建场者的忆述.....邓荣翔 (119)
梧塘镇侨胞记略.....蔡金耀 (125)
莆田涵江华侨新村兴建始末记.....江 纪 整理 (134)
兴化人与兴安会馆.....林祖泉 康永福 (138)
马来西亚、新加坡侨团简介.....康永福 整理 (140)
莆仙戏在东南亚的传播与影响.....康永福 林祖泉 (148)
《莆田文史资料》5~13辑目录..... (151)

记莆田籍南侨机工回国 参加抗战的英勇事迹

本 会 资 料 室

前 言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我国军民同仇敌忾，浴血奋战，抗击日本侵略军。海外华侨亦是义愤填膺，一面抵制日货，一面出钱出力，共赴国难。

1939年（民国28年），我国沿海港口悉被日军所占据或封锁，刚修通的滇缅公路就成为补给前线唯一的国际通道，急需一大批汽车司机和修理机工。著名华侨领袖、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陈嘉庚先生为此发出号召，动员和组织有3200多人参加的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简称南侨机工），分九批先后回国参加抗战。其中莆田籍的有40人左右。

奋战在千里滇缅公路上的南侨机工，所经历的困难的确实很多，要冲过险路关、雨季关、瘴疟关和空袭关。但艰难险阻何所惧！他们都能出色地完成了运输的任务，有1000多人还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在我国抗日战争史上是值得写下可歌可泣的一页。

在调查莆田籍南侨机工姓名和事迹中，承华侨大学华侨研究所讲师林少川和余汉洲、连光显、翁玉度、黄玉奎等同志大力的支持，并提供部分资料，谨表谢意！但在1942年（民国31年）5月，滇缅公路被日军切断后，南侨机工被迫分散各地。抗日战争胜利后，有部分复员返回南洋。因此，对莆田籍南洋机工的姓名很难全部查清，现仅将查到的记列于下：

第一批：徐元鑑 余番仔 郑文珍

第二批：许志光（副领队） 张球（分管财政）

陈家万 关玉麟（江口园顶） 关曾三

第三批：陈亚钟（梧塘前东坡） 黄玉坤（黄玉焜，涵江黄
霞） 方九十 郑流芳 吴狗治 薛亚尊

王亚六（涵江） 郭玉蕊

第四批：连文瀛（总领队，梧塘南坡） 陈玉湖

第五批：姚文贵 黄亚涛 郑文尾 吴秀峰 林文龙

林蔚仪（林新李） 李金凤 郑天赐 陈亚清

第六批：关天赐

第九批：余汉洲（新县碧溪）

批次未明的有：陈天兰（涵江后郭，解放后任莆田县侨联会
主席） 林亚田 杨金清（大洋） 陈玉蕊
黄番仔

南侨机工许志光访谈录

林 少 川

贵州之行前，我读到南侨机工许志光的一份史料，颇具传奇色彩。他在决心参加南侨机工回国抗日的同时，将其全家老小送回故乡莆田安置。他本人的爱国举动，以及老母和妻儿的如此深明大义，实在难得可贵，十分感人。至今他仍珍藏着一封1939年陈嘉庚先生介绍回国参战的亲笔信。

循着这一线索，在贵州省侨联的帮助下，我在贵阳公园路44号找到了许志光老人。见到有人专门收集有关南侨机工的历史资料，老先生显得十分激动，愉快地接受我的录音采访，话题专门

从海外家世谈起。他说：

“我是1914年出生在新加坡的，祖籍福建莆田，6岁时开始在兴安会馆创办的宏文小学读书，13岁时到陈嘉庚先生的橡胶厂当学徒，学习机修，维修制鞋机器。15岁时在一家公共汽车公司当售票员，16岁时开始学开汽车，领到驾驶执照后开了几年车，20岁就自己买一辆‘的士’。当时在新加坡，司机的收入较高，经过几年的奋斗，经营出租车，还建立了小家庭，家境逐渐好起来了。‘七·七’抗战爆发，为了支援祖国抗战，我将出租车让人开，自己出来义务做一些救亡工作，参加筹赈会的募捐活动，上街宣传筹赈救国。南侨总会发出通告，号召南侨机工回国赴滇缅公路服务，我就下定决心回国参战。”

当我问起他如何将全家老小送回国而独自轻装上阵时，许志光笑了笑说：“当时我已26岁了，上有老母，下有妻儿，一家5口，我已不能象其他快乐的单身汉那样屁股一拍就走，我必须将家属妥善安置才行，于是，决定把他们送回莆田乡下老家。母亲深明大义，妻子贤惠通达事理，他们都非常支持我参加机工团回国。当时我又动员妻弟陈光明（潮州籍），一起报名参加机工队，他也非常乐意，并愿意将其母送回国内老家。这样一来，我与内弟可以无后顾之忧，轻装上阵了。”

“当得知我打算将全家老少送回国而铁心参加机工团，陈嘉庚先生非常高兴，立即叫南侨总会秘书写了一封介绍信，并亲笔签了陈嘉庚三字……”听到这里，我迫不及待地问：“后来陈嘉庚先生这封信呢？”

“还在！还在！几十年来我一直珍藏在身边！”许志光说完，转身进入内屋，取出一张虽已泛黄但字迹仍清晰完好的信件。这是抗战时期印有“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字样的专用信笺，并盖了中英文合璧的圆形公章，信的全文如下：

逕啟者，華僑青年許志光君，熱心國家，此次毅然犧牲原有職業，回國服務司機工作，幫助國家，殊令佩欽！現伊母及其妻子，擬不日遣返原籍安居，所有沿途經過祖國關隘碼頭，一切行李檢查手續務希軍政長官予以特別優待，實為至盼。此致

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公章）

主席陳嘉庚

廿八年三月十三日

當我取出照相機翻拍這張不尋常的信件之後，許志光繼續說：

“我們是第二批回國機工隊伍，總數200多人，總領隊是鍾運熙，我被任命為副總領隊，兼任新加坡中隊負責人。回國時，新加坡《星洲日報》派了隨團記者李志達和我們一起出發。啟程那一天（1939年3月13日），碼頭上到處彩旗如林，鑼鼓喧天，鞭炮聲震耳欲聾，一片熱烈景象。新加坡和豐輪船公司派出海輪送我們踏上征途，同船回國的母親、妻子及兩個孩子，亦享受特別鋪位免費同行。她們後來轉車回到福建莆田定居，我則隨機工隊伍到達昆明，進入西南運輸處訓練所。

“在訓練所集訓之後，我被分配到西南運輸處第一大隊的補充隊當班長，從事芒市至保山之間的軍運任務。隨後，又調到第9大隊27中隊當中隊長，駐紮在保山。滇緬公路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最初是險路和瘧疾。當時該路剛搶修完工，遇到雨季，使我們嘗到‘山大王’的滋味；有時呆在山上兩三天，沒有吃的，只好上山採野果充飢；又時常被‘瘧疾蚊’咬叮，患上‘打擺子’，發冷時即使蓋上重被、裹着毛毯也無濟于事。幸虧機工战友獻出印尼籌賑會送來的‘金雞納霜’（奎寧丸），才轉危為安。”

許志光回憶說：“我們南僑機工團是在抗戰最艱苦的階段回到

祖国的，大家怀着共赴国难的壮志，离开了海外温暖的家庭，许多人还抛弃了原来优厚的待遇和舒适的生活，千里迢迢，前来报效祖国，我们回国后，按照当时的货币核算收入，月薪远远不及在南洋时的半数，而且衣、食、住、行、工具及药品都十分缺乏，工作条件极差。但是，无论在运输线上还是在机修厂里的华侨机工，大家都毫无怨言，自觉地勤奋工作。由于大家的共同努力，保证了滇缅公路上每日平均运入300吨军火，有力地支援了全国抗战。可是，华侨机工的爱国热情，却遭到国民政府有关当局的冷遇，分配到的尽是一些老掉牙的杂牌车，行车路线也尽是环境恶劣的危险地段。加上当时滇缅、滇桂黔一带气候多变，疾病流行，使回国华侨机工的生活十分艰苦，不少人因翻车事故及疾病献出年轻的生命。鉴于这些情况，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于1939年8月派出交际委员刘牡丹前来慰问，并将了解到的有关实际情况向总会报告，总会立即着手改善回国服务人员待遇。1940年初，在海外侨胞的资助下，南侨筹赈总会首批将100辆美制‘GMC’牌新货车运到仰光，我们组织机工把车接回来，并按照总会的意图，组成了华侨先锋运输队第1大队。事隔不久，总会又将100辆美国新制的‘大道奇’货车经仰光运来，于是又成立了华侨先锋队第2大队。两个运输队的人员全部都是华侨。后来，由于时局发生变化，总会原订分批给运输队送车的计划被迫中断。1940年底，华侨先锋运输1大队和2大队在缅境的腊戍、八莫一带执行任务以后合并，原1大队队长刘贝锦任大队长，连文瀛任大队副，我担任了第3中队长，继续在中缅边境的遮放至保山一带担任紧张的运输工作。”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1942年初，日军由缅甸进逼云南边境。许老先生回忆起这一时期，心情十分沉重：

“当时我们中队奉命由遮放撤回昆明，一路上塞车难行，

我于5月4日天亮时开过惠通桥，当晚刚到保山时，那‘5·4’保山惨案，被炸尸体惨不忍睹，事后得知，仅我们中队就有十几辆卡车在龙陵一带遇敌后下落不明，有的被阻隔在怒江惠通桥西岸，很可能已经牺牲了。

“滇缅公路断绝后，在混乱的时局中，南侨机工团的成员四处流散，许多人过着十分艰苦的生活，白天外出自行谋生，晚上就住在防空洞中。本人也历经一段失业流浪的生涯。尽管如此，机工队的大多数成员，仍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顽强地向困难作斗争，坚持到抗战胜利。”

当我问及抗战胜利后，南侨机工的境遇如何时，许老先生说：“抗战胜利后，已改名为中缅运输局的原西南运输处移交给云南运输公司。南侨机工纷纷要求返回南洋与家人团聚，但遭到国民党政府别有用心的阻挠。为此，陈嘉庚先生于1946年6月在吉隆坡召开‘支援华侨机工复员大会’，要求政府做好机工复员工作。随后，各地机工来到昆明登记，截至当年年底，只剩1000多人机工前往登记，陆续返回南洋者仅1000多人。大家遥想当年共有3000多人回国参加抗战，如今已有三分之一牺牲了，我们虽然为此伤心落泪，但也因为替祖国作出贡献而感到光荣与自豪。新中国成立后，尚有数百名机工留在云贵高原一带。而如今，贵阳只剩下3人，且都年逾古稀，已垂老矣。但每当我回想起这段战斗经历，常常又觉得回到青春热血沸腾的时代。”

记南侨机工余汉洲

林 少 川

在纪念南侨机工回国抗战50周年（1939~1989）前夕，笔者在莆田县侨联访问了原马来亚新山南侨机工余汉洲。他是1939年参加第九批机工团赴滇缅公路服务的，战后复员南返。50年代，回来参加祖国建设，长期从事侨联工作，直至1978年退休在家。余汉洲的回忆录，为我们编写南侨机工史提供了一份较为详细的史料。

余汉洲于1913年，出生在莆田山区新县镇巩溪村，因其父患病未能下田劳动，靠母亲辛勤操劳，难于维持生活。5个姐妹不得不先后送给人家，4个兄弟最后也留不住，不得不将最小的弟弟送人。余汉洲只念了三年私塾，因生活困难，便跟人学制棕衣手艺，18岁时，到涵江一家客栈当杂工。21岁时，他向亲友借了路费，前往南洋投靠二哥。他二哥是早几年到马来亚的，在柔佛新山开一间理发店。他由二哥介绍，找了修补车胎的工作。不久，他跟朋友学开车，考取驾驶执照之后，生活开始好转起来，能汇款接济家用。经过几年的辛勤积累，正当他准备与朋友合股做生意时，不料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激起海外华侨的极大义愤，抗日救亡活动搞得热火朝天。余汉洲也热心参加卖花募捐等爱国活动，并自愿捐出工资的一部分，统一交由南侨总会汇回祖国。

到了1939年，抗战进入危急关头，新开辟的滇缅公路急需大量司机，陈嘉庚先生登报号召南侨机工回国服务。余汉洲看到好几批华侨青年参加机工团回国的动人情景，也产生报名回国的念

头。可是，他又想到自己是借路费来的，如今有了司机职业，安稳舒适的好日子才刚开始，还可以经常汇款帮助家用。回国要吃苦，甚至流血牺牲。他思想斗争确实很激烈。但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当他看到报纸上刊登日军侵华暴行，得知祖国同胞遭受蹂躏，他再也按捺不住对日军愤怒的心情，便下定决心报名回国。

余汉洲拿定主意后，便到柔佛振林山黄梨厂找当地筹赈会报名。但按规定还要商店担保。他因原来拟办的合伙商店还未开张，第一次未能报上名。于是，他回来找一个朋友介绍请振林山振兴食品公司作担保，由该公司老板带去办理报名手续。接下来，他们集中在黄梨厂进行训练，不久，全体到新山医院进行体检。

体检一关一关顺利通过了，可是，最后一位医生却突然通知余汉洲留下，其余的先回去。这使他感到有什么地方不妙，于是忐忑不安地望着医生。医生问：“家里还有兄弟吗？你为什么要回国？”余答：“兄弟有三个，我属老三，回国为了抗日救国，虽然有危险，但家中有兄弟，没有关系！”医生听后，高兴地说：

“好，有志气，你合格了，让你回去救国吧！”说着，又从裤袋中掏出一封信来说：“你回去看看就知道！”余汉洲觉得奇妙，走出门口就打开一看，原来是二哥余玉清写的，目的是阻止他回国。二哥早几年来南洋，赤手空拳谋生不易，如今已开了一间不小的理发店，他曾多次劝弟弟不要回国，希望弟弟珍惜时机多赚些钱寄回家赡养父母，做个孝顺儿子。可是余汉洲偏偏听不入耳，故写信请求医生留人。信是这样写的：

“医生：我只要求您说一句话就好，余汉洲体检不合格，不能参加回国，附上200叻币给你吃茶，谢谢！余汉洲之兄拜托！”

当天晚上，余汉洲带这封信及200叻币去找二哥，讲明回国的决心。至此，二哥亦不再强留了，只是抱着弟弟大哭一场，然

后交代今后应自己保重，抗战胜利应及早回来。

告辞了二哥，余汉洲等一行集中在振林山黄梨厂待命，等待南侨总会通知返国日期。他们这一小队，选出队长陈友国、副队长陈聪明，队员是李洋发、陈仕坛、林兆坤等20多人。

余汉洲等一行由新山到新加坡统一编入第九批南侨机工回国队伍。这批人数最多，达500多人。1939年8月14日，他们由新加坡启程，数天之后抵达昆明。

余汉洲刚到昆明西南运输处训练所，感到很不习惯。首先是伙食差，但华侨机工回国不是为了享受，这还比较容易克服；其次，觉得军训内容枯燥无味，机械死板，华侨机工普遍反映，回国参加军事运输，只要能熟练驾驶及维修就行了，不必那么呆板地操练；此外，还有打架的问题，机工曾与昆明军校的学生在街上因口角而发生过几次斗殴事件。

1939年12月，训练结束后，余汉洲分配到第5大队13中队当班长。当时第5大队运输路线主要从昆明到贵州、湖南、广西等地，运载的都是抗战军用物资。日机时常在上空盘旋扫射，曾有一个时期，白天不能开车，改在傍晚出发，第二天早上又停车，只靠夜间抢运。

有一天，余汉洲出车到贵阳运桐油，车开出离桐油站3公里处，突遇日机空袭，汽车后门板被射穿了十几个洞，幸亏人未受伤。还有一次十分惊险：余汉洲一组3车由毕节装军用棉衣回昆明大板桥附近，日机扔下炸弹在车边爆炸，车被气浪震翻到公路边水沟里，余汉洲与莆田老乡林亚田都落入沟中，浑身都是泥土，汽车报废了。

在滇缅公路上抢运，几乎每一个华侨机工都有一段出生入死的传奇经历，余汉洲也是这样。他除了自己亲身经历之外，还有许多亲眼目睹的惨剧。

第12大队的新加坡南侨机工杨金清，原籍莆田大洋乡。1941年由保山开车来昆明，停车在西站修理，因紧急警报由车场开出避空袭时，在西山公路急转弯处撞车死亡，遗体由西南运输处就地埋葬。

第5大队补充队有个新加坡南侨机工，土名黄番仔，亦是莆田籍。1941年5月间，由贵州运钨沙出发，车经贵州与云南交界的地方，被云南平彝弯检查站哨兵开枪打伤，因流血过多无人抢救而死亡。经第5大队13中队发现，报告大队派人去处理，结果只好就地掩埋。

12大队的新加坡机工陈玉蕊，也是莆田人。1942年4月间，由下关出发去缅甸八莫抢运汽油回国，因该路是单程线窄路，从八莫开夜车的途中不幸翻车，掉入深谷，连车带人不见踪影，加上天黑无法抢救，连遗体也无法收拾。

后来，西南运输处改为中缅运输局，下关第2大队的新加坡机工方九十，原籍福清，1943年12月间，由下关出发往贵州毕节，经过‘替天高’险路时，翻车身亡，大队部派人前往收尸就地埋葬……仅余汉洲记忆所及，车毁人亡的南侨机工，现在还叫得出名字的有十几人，还有更多的是已记不清他们的名字了。他们都是为抗日救国而英勇献身的无名英雄！历史是不会将他们遗忘的！

值得特别一提的是，还有一位新加坡南侨机工陈亚清，祖籍莆田，属第9大队。有一次由保山出发到腊戍运武器返回，行驶至惠通桥边，不幸由半山翻入深谷，幸而及时发现，经抢救头部缝了21针，从死神那里夺回了一条生命，这可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战后他留在云南，直至不久前逝世。

1942年5月，由于日军入侵，滇缅公路切断了，余汉洲与广大南侨机工一样，度过一段最困难的时期……

后来进入滇西收复失地的反攻战斗中，南侨机工继续投入运

输工作。1943年底，重庆派卫立煌为总司令负责滇缅反攻指挥，南侨机工又归入十一集团军统一领导，负责协助运兵员、武器奔往前线。在紧张的松山反击战中，余汉洲曾连续十几天日夜抢运。夜里没有机会睡在床上，只好在驾驶室打盹。有一天，余汉洲的车出故障，暂停放在保山修理，搭别人的车回下关队部，在离保山30公里处，因车开太快而转弯翻入路边，四轮朝天，他的脚受了伤。幸好治疗及时，康复后能继续开车。

1945年8月，余汉洲出车到昆明，听到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车子交昆明中缅车场，便到昆明华侨互助会，准备等候办理复员手续。但好事多磨，复员工作被拖了一年多，经陈嘉庚先生在海外奔走呼号，国内机工选代表多次到重庆交涉，最后才办理复员手续。

余汉洲参加第一批复员机工，由昆明出发，取道贵州，经广西到广州，然后乘火车到香港，转乘轮船经安南抵新加坡。在新加坡登岸时，受到华侨社会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

不久，南返的机工在陈嘉庚先生的关心与支持下，正式组织建立“南侨复员机工互助会”。余汉洲作为首批基本会员，担任该会交际职务，积极奔走为复员机工谋福利。此时，他还参加兴安会馆、司机工会、柔佛州理发总会等各种社团的活动。为了开展各地交际工作的方便，他开着一辆小轿车四出活动。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他们在海外联络各界人士热烈庆祝，并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

50年代初，新中国的内政外交取得了极其辉煌的成就，引起世界的关注，更给海外华侨以巨大的鼓舞。祖国，象巨大的磁铁吸引着无数海外赤子回归到她的怀抱。一批批青年学生回国升学，一批批科学家、技术人才从世界各地冲破重重封锁回国报效。余汉洲亦决心回国，继续为祖国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955年3月22日，余汉洲启程回国。回国之前，南侨复员机工互助会写了四封信由他带回。一封致北京中侨委、一封致陈嘉庚先生，另外两封分别给汕头海关及莆田侨委会。其中致陈先生的信，是全体南侨机工职员写的，拟组织发动一批海外华侨技术人员回国为建设新中国服务。

船到汕头，边防部队派人前来迎接，余汉洲取出致北京中侨委和陈嘉庚先生的信，他们立即与北京通电话，得知陈先生近日在福建集美，便送余汉洲到集美。

余汉洲到集美见到了陈嘉庚先生。陈先生说，海外拟组织南侨机工等技术人员回国参加工作，现时对这批人不大适宜，因这批人年纪都大了，解放军队伍是十八至廿五六岁的年轻人。他叫余汉洲写信给南洋，不要组织机工回国，理由介绍给他们听就可以。陈嘉庚先生又问：“你要回南洋，还是要留下？”余汉洲说，要留下来工作。陈老先生便对他说：“好，你先回去休息，今后本地政府会通知你的。”

余汉洲回国后，定居在故乡莆田，1955年7月间，他到县政协报到，担任华侨组工作，并任莆田华侨新村筹委会委员，省华侨投资募股委员会委员，莆田华侨投资募股委员会委员。莆田县侨联会选他为华侨代表，连任华侨代表至今，又当选为历届侨联委员，并选为第一、二届政协委员。1970年10月，余汉洲调到县干部招待所，直至1978年退休。

当回忆起当年参加南侨机工回国抗战的经历，余汉洲老人感慨地说：“我响应陈嘉庚先生的号召参加机工团回国抗战，这是我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事。现在回忆起来，可以说青春无悔。最近政府又专门下文照顾南侨机工享受100%退休金待遇，还在云南建立南侨机工纪念碑，这不仅使我们这些幸存者心满意足，而且更可以告慰那些已逝的南侨机工无名英雄的在天之灵了！”

南侨机工云南联谊会副理事长王亚六访谈录

林 少 川

在云南南侨老机工中还有一位“年轻人”，实际上他也年逾古稀了。可为什么还称他“年轻人”呢？原因有二：一是目前幸存的南侨机工，大都年近八十或已逾八旬了，故战友们喜欢亲昵地呼他为“年轻人”；二是他身体确实好，热情特高，思维敏捷，充满活力，联谊会的各种工作，他都抢着义务去做，干劲不亚于小青年，故荣获这一“美誉”。

这位“年轻”的老机工，就是南侨机工云南联谊会的副理事长王亚六。他祖籍福建莆田涵江，现居昆明，我曾多次登门拜访，可是他每次谈得更多的都是机工战友轶事。他说，一些已故战友的事迹，如果我们活着的知情者不讲，无名英雄们的故事就难免失传了。当他将其所知的战友故事一一谈完之后，这次我出个题目，让他谈谈自己“在滇缅公路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他终于从自己谈起了：

军训果然派上用场

我是参加第三批机工回国的。1939年3月27日，乘丰平轮出发，4月3日抵达昆明。西南运输处派卡车把我们接到潘家湾司机训练所。初到训练所已是深夜，最深刻的印象是给我们三个“下马威”：第一个“下马威”是当夜寒流袭击，令人冷得发抖。我们是从长年炎夏的星洲来到大西南的，一下子急剧降温，挨冻的滋味是前所未有的，确实难受。不过，我们早有思想准备